

丝绸之路文化带：唐朝至元朝时期 中阿文化交流与互鉴*

[苏丹] 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 著 王光远 编译

内容提要 中阿关系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很多阿拉伯文和中文史籍文献对唐、宋、元时期的中阿文化交流有丰富的记载。在古代丝绸之路上，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不仅建立了一条经济带，也构建了一条富有多彩活力的文化带。这条文化带盛于唐，辉煌于两宋，蓬勃发展于元，中阿文化交流在此期间取得了丰硕成果。丝路文化带的繁荣促进了中阿商旅往来与经贸活动，增进了中阿人民的相互了解与民族融合，推动了中阿科学与制造技术的双向流动，为东西方的文明对话与和谐共生奠定了基础。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应以史为鉴，深化双边人文交流，加强新时期丝路文化带的建设，以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关键词 中阿关系 丝绸之路文化带 “一带一路” 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 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 (Gafar Karar Ahmed)，苏丹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大使（北京 100600）。

译者简介 王光远，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讲师（北京 10008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造福于沿线人民的经济、文化和人文领域的合作机制，旨在实现沿线国家的共赢发展。事实上，阿拉伯人是“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阿拉伯人的港口和大型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阿拉伯史学经典《历史大全》的汉译与研究”（19ZDA238）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在《文化带：中阿文化交流史》（载阿拉伯团结研究中心月刊《阿拉伯未来》2017年5月号，总第459期，第59~103页）一文基础上修改而成。

城市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站点，为丝路经济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回望数个世纪，中阿商旅往来穿梭于这条商路，不仅推动了东西方的贸易往来，也传播了宗教文化，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早在前伊斯兰时代，中阿之间的交流往来就已存在。由于享有独特的地理位置，阿拉伯半岛地区是地中海与亚洲东部诸国古老商路的重要连接点，发现于东印度群岛和菲律宾的希木叶尔文字石刻为此提供了有力佐证。^①此外，中国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著名学者沈福伟也谈到，在“春秋时期的古墓中发现了一颗蜻蜓眼珠样式的埃及玻璃珠”这一史实。^②尽管古代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相隔万水千山，但生活在这两个地区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互鉴从未间断，形成了一条富有多彩活力的文化带。唐朝至元朝时期是中阿文化交流的兴盛时段。本文拟基于中阿古代史籍文献，探究这一时段丝路文化带的深远影响，展现绵延数个世纪的中阿文明对话与文化融合。

一 唐代中阿丝路文化带的繁盛

古代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公元7世纪后，伊斯兰文明在广阔领域的深入传播，与唐帝国的繁荣稳定交相辉映，中阿之间的人员交往与经贸往来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一）商旅人员的流动

活跃的商业贸易与频繁的文化往来，使得前来中国并定居于此的商旅人员日益增多。唐帝国的都城长安也同巴格达一样，成为极具吸引力的世界文化中心。阿拉伯人、古叙利亚人和波斯人来到这座都城，与中国、朝鲜、日本和印度的学者在宗教、文学和文化领域进行广泛交流与讨论。^③这是古代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也是文化带上一种成熟的文化共存方式。

事实上，当丝路文化带上的两大文明中心长安和巴格达一同步入繁荣时，自北魏起在中国长期居留的阿拉伯人就已完成本地化，成为大唐的臣民。除

^① [伊拉克] 费萨尔·萨米尔著：《远东地区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历史起源》，伊拉克新闻部，1977年版，第9页。

^② Shen Fuwei, *Cultural Flow Between China and Outside World through History*, Translated by Wu Jingshu,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6, pp. 27 - 28.

^③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1,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reprinted 1979), p. 125.

文化和商贸活动外，阿拉伯人还从事手工业制造，如公元622年他们在广州建立了一个作坊。^①早在公元628年之前，来华定居的阿拉伯人就已经开始娶中国女子为妻，因为在628年唐太宗曾下旨禁止外族人离开时带走中国妻子。^②阿拉伯典籍中的相关记载为此提供了佐证，伊本·纳迪姆^③在《目录》中写道：“如果我们有人娶了中国的妻子，想要离开时，会被告知：‘留下土地，带走种子。’如果被人发现他偷偷带走妻子的话，就要缴纳罚款。”^④这些归化的阿拉伯人很早就建有中国式的私塾，充分表明了他们融入中国社会的意愿。^⑤实际上，这部分人为阿拉伯文明和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因为在明朝及之后的历史文献中都记载着一个史实，即先知穆罕默德在世期间，曾有4个阿拉伯人自阿拉伯半岛前来中国传教。第一个人定居广州，第二个人定居扬州，第三个人和第四个人定居泉州。^⑥但是，也有到中国传播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景教）信仰的阿拉伯人，在《目录》中的“中国人的教义及其片段”部分记载有以下内容：“大约在公元980年，6名纳季兰人牧师被贾斯利歌派往中国传教，其中一位名为纳季兰尼的牧师和另外一个人在六年后从中国归来。”^⑦他向这本书的作者伊本·纳迪姆讲述了其中的经历。

伊拉克学者哈迪·阿莱维指出，早在公元635年哈里发欧麦尔执政初期，一个在中国史籍中名为阿罗本的基督教传教士就从伊拉克摩苏尔来到了中国。阿罗本此行的目的是在中国传播聂斯托利派教义，唐太宗接见了他并准许他在长安建立一座教堂。^⑧在今天的西安，依然可以看到那座于公元781年为表

① Marshall Broomhall, *Islam in China: A Neglected Problem*, London: Morgan and Scotts, 1910, p. 8.

② 冯今源著：《中国的伊斯兰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③ 全名穆罕默德·本·伊斯哈格·本·纳迪姆（935—994），阿拉伯历史学家和书目编纂家。他编纂的《目录》一书为当时阿拉伯语书籍之总索引，主题涵盖宗教经典、圣训、历史、法律、诗歌等。——译者注

④ [阿拉伯]伊本·纳迪姆主编：《目录》（阿文），埃及大学佚名教授编订，开罗：大商务出版社、拉赫马尼亚出版社，无出版年份，第392页。

⑤ 冯今源著：前引书，第7页。更多资料可参见[苏丹]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中阿关系》，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5年。

⑥ 老秦：《扬州的穆斯林——过去和现在》，载《中国建设》1989年第9期，第41页；冯今源著：前引书，第1~5页。

⑦ [阿拉伯]伊本·纳迪姆主编：前引书，第490页。

⑧ 参见[伊拉克]哈迪·阿莱维著：《中国拾珍》（阿文），大马士革：麦达出版社，1994年版，第290页；Joseph Needham, op. cit, p. 187.

彰阿拉伯聂斯托利派传教士功绩而立的石碑。^①因此,正如哈迪·阿莱维所言,允许来华阿拉伯人传播宗教信仰,建造教堂和清真寺,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人对外来宗教的包容。来华定居的阿拉伯人既没有受到文化上的压迫,也没有与中国人发生文化对抗。他们不仅融入了中国社会,甚至还参加了科举考试,而这不仅要精通中文,还需要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和认知。据唐朝史籍记载,唐宣宗年间,一个名为李彦升的大食人由汴州刺史推荐参加科举考试,一举及第,入朝为官。他也因精通中国文化被冠以“形夷而心华”的美誉。^②得益于阿拉伯人对中国了解的不断深入,以及下文即将讲述的阿拉伯历史和地理学家对中国正面形象的塑造,当阿拉伯帝国内部政治社会矛盾激化后,一些反对者将中国视为避难之地。

乔治·胡拉尼(George F. Hourani)援引历史学家麦尔瓦兹^③的记载称,有什叶派人士在公元750年从呼罗珊流亡至中国,落脚在一条面朝港口的大河中的一座岛屿上。这群人此后一直居留于此,从事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中转贸易活动。^④哈迪·阿莱维在《中国拾珍》中对此进行了精辟点评,他认为对于当时的穆斯林来说,东方和欧洲都属于异教徒的土地,但反对派宁愿前往路途遥远的东方也不选择距离更近的欧洲,其原因就在于东方从未出现过像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发生的那种大规模宗教战争,而这也为区分异教徒之地和战争之地提供了依据。哈迪说:“即使这是一个政治判例,而不是从教法上对二者进行区分,但穆斯林在现实中却已经遵循了这一区分原则。”他还指出,在伊斯兰文学中,当提到中国和印度时,叙述者的语气往往是自然且平和的,而提及罗马和法兰克王国时却伴随着咒骂。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被称作罗马暴君,法兰克国王则被称为暴君或法兰克暴君,而对中国和印度君王的称呼则是正常的。^⑤

(二) 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习俗的相互认知

阿拉伯人是最早将中国介绍给世界的民族之一。在唐代,一些阿拉伯和

① [美国] 菲利普·希提、爱德华·乔治、加布里埃尔·贾布尔著:《阿拉伯通史》(阿文)第二卷,贝鲁特:发现出版社,1961年版,第436页。

② 《全唐文》第八部卷七六七。

③ 全名穆罕默德·本·纳斯尔·本·哈查只·麦尔瓦兹(818—906),中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和教法学家。——译者注

④ George F. Hourani, *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1, p. 63.

⑤ [伊拉克] 哈迪·阿莱维著:前引书,第294页。

穆斯林商旅对中国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在他们的游记中有很多关于中国的宝贵资料，其中首推伊拉克商人和旅行家苏莱曼·西拉非。苏莱曼对中国情况之熟稔，给人感觉他并非商人而是一位学者。在记录其旅行见闻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苏莱曼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进行了详细记述。他描述了中国帝王的公正，统计了中国城市的数量，称中国有200多座城市，每座城市都有王与宦官，并下辖若干小城。^①在谈及中国人的宗教时，苏莱曼写道：“中国人崇拜偶像，向其礼拜，并祈求祷告，他们有经典和宗教。”苏莱曼似乎也知道中国佛教源自印度：“中国没有知识（宗教），他们的宗教来自印度。”而对于在华穆斯林，苏莱曼称他们享有信仰自由。^②此外，苏莱曼还提到古代中国的医学和天文学：“中国人有医学，其中使用最多的是灸，中国人也有星相学。”^③

苏莱曼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他指出，所有中国人都可以接受免费教育，“无论穷人还是富人，小孩还是成年人，都要识字习文。”而且，“每城皆有一私塾，穷人和他们的孩子们在此接受教育，饮食则由国家供给。”苏莱曼还首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的饮茶习惯：“他们将干草用热水冲泡后饮用，每个城市都有这种干草生意，且数量巨大。他们称此物为茶（Sakh）。”^④

除苏莱曼等旅行家外，阿拉伯地理学家们也对中国进行了研究，如在伊本·鲁斯特^⑤的著作中有一些唐朝与吐蕃的资料。他提到了吐蕃空气状况以及唐与吐蕃所产麝香的区别，称“最好的麝香来自广州”。此外，他还历数了前往中国的商路。^⑥最重要的有关中国的地理著作当属伊本·胡尔达兹比赫^⑦的《道里邦国志》。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是研究中阿海陆贸易路线的专家，对沿

① [阿拉伯] 艾布·宰德·哈桑·本·叶齐德·西拉非著：《西拉非印度、中国、日本和印尼游记》（阿文），巴格达：现代出版社，1961年版，第44页。

② 同上书，第34页。

③ 同上书，第49~50页、第55~57页。

④ 同上书，第47页、第49页和第52页。

⑤ 全名艾哈迈德·本·欧麦尔·本·鲁斯特（？—912），十世纪波斯探险家和地理学家，著有《珍宝录》。——译者注

⑥ [阿拉伯] 伊本·鲁斯特著：《珍宝录》（阿文）第七卷，莱顿：博瑞学术出版社，1892年版，第313页。

⑦ 本名艾布·卡西姆·欧拜杜拉·本·阿卜杜拉（820—912），阿拔斯王朝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著有《道里邦国志》，又称《省道记》或《道程与郡国志》。——译者注

线300多个城市的情况了若指掌。在论及中国的精美瓷器时,他详细描述了通向中国的路线:“鲁京是中国的第一个港口,走海路或陆路100波斯里^①即可抵达。从鲁京航海只需4天,便可到达中国最大的港口康府,陆行则需约20天。”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还指出了从康府到汉久再到康图的路线,^②并介绍了中国的大体情况与位置,如“中国有300座大城市,人口稠密,声名远扬。中国的边界从大海延伸到吐蕃和突厥,向西抵达印度。”^③此外,他介绍了从北非到中国的路线:先从克里斯玛到君士坦丁堡再到巴格达,之后前往乌布拉,继而前往阿曼,从那里再前往信德、印度和中国,^④并称“所有的道路彼此相连”。^⑤可以说,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著作是研究中世纪中阿海陆交通线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也是研究这一时期丝路文化带的重要文献。

关于中国的记述在阿拉伯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例如,晚唐时期的雅古比^⑥在《雅古比历史》中提到了中国的帝王,指出他们是公正的君主。他还记录了在巴比伦时期中国使团到访伊拉克的情况。同样,他也详细描述了通往中国的海陆航线,以及中国人的习俗,如“他们崇拜偶像和日月,他们的偶像有节日,最大的节日就是在每年初一,名为扎拉尔。人们纷纷出门聚集在一起,欢声笑语,准备丰盛的食物和饮品”。^⑦

与此同时,在中国唐朝也不乏介绍阿拉伯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的典籍,首当其冲的就是杜环的《经行记》。杜环是唐朝著名历史学家杜佑的族子,在怛逻斯之战中被俘,后被带到当时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库法。杜环在阿拉伯国家游历十年后,于公元762年乘商船回到中国。归国后,杜环将他在阿拉伯国家的生活和游历见闻悉数写入了《经行记》中。杜环对巴格达和库法等地

① 1波斯里约合3.25英里。——译者注

② 对于上述地名,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鲁京是交州,康府是广州,汉久是泉州,康图是江都。——译者注

③ 原载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该书部分内容被艾布·法拉吉·古达迈·本·贾法尔·巴格达迪引用在他的《税册及其编写》一书中,参见[伊拉克]艾布·法拉吉·古达迈·本·贾法尔·巴格达迪著:《税册及其编写》(阿文),巴格达:穆萨那出版社,1889年版,第69页。

④ 克里斯玛位于今苏伊士湾北部。乌布拉位于波斯湾北部巴士拉以东地区。信德约为今巴基斯坦信德省地区。——译者注

⑤ [伊拉克]艾布·法拉吉·古达迈·本·贾法尔·巴格达迪著:前引书,第154页。

⑥ 全名艾哈迈德·本·艾比·雅古比·本·贾法尔(?—897),九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著有《列国志》和《雅古比历史》等。——译者注

⑦ [阿拉伯]雅古比著:《雅古比历史》(阿文)第一卷,贝鲁特:萨迪尔出版社;贝鲁特出版社,1960年版,第181页、第183页。

的宗教、经济和社会生活状况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记述，反映了库法的社会生活和阿拔斯王朝的形势。^① 杜环的《经行记》是中国记载伊斯兰教最早的汉文典籍，客观准确地反映了那一时期伊斯兰教治下的社会生活与经济状况。此外，唐德宗时期的地理学家贾耽的《皇华四达记》也是一部佳作，里面包含有很多关于阿拉伯世界的资料。

唐朝历史典籍中有关阿拉伯的记载，不仅反映了中国对阿拉伯半岛政治和经济情况的深入了解，也反映出中国对这一地区局势变化的密切关注。《旧唐书》中记载：大食国（阿拉伯）在安息（波斯）之西，以古莱氏部落为主导。该部落分为哈希姆氏族和麦尔旺氏族。哈希姆氏族中出现了一个勇健多智的男人（先知穆罕默德），他与敌人英勇作战并成为叶斯里卜（麦地那）的执政者。^② 《旧唐书》中还记载：“大业中，有波斯胡人牧驼于俱纷摩地那之山，忽有狮子人语谓之曰：‘此山西有三穴，穴中大有兵器，汝可取之。穴中并有黑石白文，读之便作王位。’胡人依言，果见穴中有石及稍刃甚多，上有文，教其反叛。”^③

尽管该记载与历史事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出入，但它仍比较清晰地讲述了伊斯兰教初期的情况，即从先知穆罕默德隐居麦加郊外的希拉山山洞，真主向其降下启示，之后先知开始与伊斯兰教敌人斗争，最后迁徙麦地那成为首位执政者的全过程。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还记载有阿拉伯军队的行军路线，如从沙漠中出发越过底格里斯河，最后达到印度。中国人对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有明确的区别，他们将伍麦叶人称为白衣大食，而将阿拔斯人称为黑衣大食。中国人还了解并记载了伊斯兰帝国的内部斗争。^④

（三）工匠技艺的传播与交流

除了中国的地理环境与社会风俗外，阿拉伯地理和历史学家还记录了中国的精美器物与工匠的高超技艺。例如，伊本·法齐赫^⑤在《诸国简编》中

^① 《通典·边防九·大食国》。译文为《通典》原文，引自[唐]杜佑：《通典》（下），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2756页。

^② 《旧唐书·西戎传·大食国》。

^③ 译文为《旧唐书》原文，引自[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第4册，陈焕良、文华点校，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3363页。——译者注

^④ 参见《旧唐书·西戎传·大食国》和《新唐书·西域传·大食》。

^⑤ 本名艾布·伯克尔·艾哈迈德·本·穆罕默德·哈马达尼（？—951），又名伊本·法齐赫，波斯历史学家与地理学家。——译者注

写道：“中国人擅于手工制造，在这方面真主赋予了他们举世无双的天赋。他们有精美光滑的丝绸、夜明灯以及其他巧夺天工令人称奇的器物。”^①他甚至认为中国工匠参与了所罗门神殿的建造，在神殿装饰与铜器制作方面贡献技艺，因为所罗门王曾“派人到中国带回了一个能制作黄铜和青铜器的匠人。”^②但是伊本·法齐赫并未说明这一史料源于何处。

历史学家泰伯里^③在谈及新疆喀什时从侧面印证了中国器物的精美：“在这一年（公元751年），巴尔赫的首领艾布·达乌德·哈立德·本·易卜拉欣攻入喀什，从喀什人手中劫掠了一些他们从未见过的中国镶金器皿，此外还有夜明灯、丝绸绸缎等其他中国珍宝。”^④另一位历史学家麦斯欧迪^⑤对中国人的高超技艺颇为赞赏，他在《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中写道：“在真主所造物中，该国人民拥有最为灵巧的双手，极为擅长雕刻与绘画，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制造出超过他们所造之物的东西。”^⑥

中国工匠的高超技艺不只被记录在文献典籍中，也通过文化带切实传入了阿拉伯地区。杜环在《经行记》中提到过库法的陶瓷和玻璃市场，并称他在库法时遇到了一些来自大唐的画师和纺织技工，其中有两名画匠樊淑和刘泚来自京兆（长安），另有两名纺织技工乐陵、吕礼来自山西。^⑦

而中阿技术交流应肇始于造纸术的西传。公元751年怛罗斯之战后，精通造纸技术的中国战俘将造纸术传入阿拉伯。张广达援引阿拉伯历史学家塔米姆·本·巴哈尔的记载称，塔米姆本人曾在撒马尔罕亲眼见到过精通造纸术的儿童，他们是中国战俘的后代。^⑧公元793年，在哈里发哈伦·拉希德

① [阿拉伯]伊本·法齐赫著：《诸国简编》（阿文），莱顿：博瑞学术出版社，1885年版，第251页。

② 同上书，第99页。

③ 全名穆罕默德·本·哲利尔·泰伯里（838—923），中世纪《古兰经》注释家、圣训学家、伊斯兰教法学家和历史学家，阿拉伯编年体史书鼻祖。——译者注

④ [阿拉伯]泰伯里著：《历代先知和帝王史》（阿文）第七卷，穆罕默德·艾布法德鲁·易卜拉欣校订，开罗：知识出版社，无出版年份，第464页。

⑤ 全名阿里·本·侯赛因·本·阿里·麦斯欧迪（896—957），旧译马苏第，阿拉伯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旅行家，著有《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译者注

⑥ [阿拉伯]麦斯欧迪著：《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阿文）第一卷，穆罕默德·穆赫伊丁·阿卜杜勒哈米德校订，开罗：世界图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⑦ 《通典·边防九·大食国》。

⑧ 张广达：《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联系的回顾》，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54页。

的授意和支持下，第一个由中国工匠主持建造的造纸工坊在巴格达建成。此后，另一个规模更为庞大的造纸厂出现在了大马士革。公元900年左右，造纸术传入埃及，之后于公元1100年左右传入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又在公元1150年左右传入安达卢西亚（西班牙）。^①此后，造纸术才传入欧洲和美洲。

事实上，阿拉伯古代典籍中就有造纸术从中国传入的明确证据。伊本·纳迪姆指出：“来自中国的制造技术在胡罗珊被广泛应用，如造纸技术。”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将纸张作为撒马尔罕的特产之一，撒马尔罕生产的纸取代了此前用于书写的埃及纸和兽皮，因为撒马尔罕纸的质量更好，也更柔软细腻，而这只能出自中国。^②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也提到：“被齐亚德·本·萨利赫^③俘虏的中国战俘在伊历135年前抵达了撒马尔罕，从那时起造纸行业开始出现，纸张变成了撒马尔罕人的贸易商品，被销往全国各地。”^④比鲁尼^⑤也认为造纸术传自中国战俘，在《印度志》中他写道：“撒马尔罕的（造纸）产业始于战俘，然后扩展至全国各地，解决了纸张匮乏的问题。”^⑥

除造纸术外，中国的制瓷与纺织技术也在这一时期通过文化带传入了阿拉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哈里发穆阿塔绥姆于公元838年下令建造的萨马拉城地穴中，发现了一些仿中国样式的伊斯兰瓷盘，以及大量产自中国的瓷器，其中一些仍陈列在巴格达博物馆。萨马拉阿拉伯人仿制中国瓷器的水平很高，成品几乎与从中国进口的瓷器如出一辙，仅凭肉眼难以分辨，只能通过检测土质来进行判定。在萨马拉出土的中国样式器物中，有一种短嘴单把双耳壶，壶身上的黄色琉璃线与深红色浮花锦缎交相辉映，这是唐代瓷器所特有的装饰图案。在制瓷工艺后，丝绸纺织技术也传入阿拉伯，在苏哈尔

① 张广达：前引文，第754页。也可参见[美国]菲利普·希提、爱德华·乔治、加布里埃尔·贾布尔著：前引书，第425页。

② [阿拉伯]伊本·纳迪姆主编：前引书，第392页。

③ 阿拔斯王朝将领。在751年的怛罗斯战役中击败唐朝将领高仙芝。——译者注

④ [阿拉伯]伊本·纳迪姆主编：前引书，第392页。

⑤ 全名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比鲁尼（973—1048），中世纪科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数学、天文学、历法学和地理学的研究也颇为精深，著有《麦斯欧迪原理》、《药理学》、《地理志》等。——译者注

⑥ [阿拉伯]比鲁尼著：《印度志》（阿文），奥斯曼知识界出版社，1958年版，第133页。

和大马士革开设有数家丝绸工厂。^①因此,中阿之间不仅有商品流通,也有技术与工艺的传播与交流,伊斯兰瓷器艺术的发展就是一个明证。

(四) 医药知识的互鉴

医药交流是唐代中阿文化带发展的另一项重要成果。阿拉伯医药自唐代早期就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阿拉伯人运往中国的货物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草药。在《唐大和尚东征传》一书中,记载有唐朝天宝年间来华穆斯林商船的情况,其中记载商船数量多不胜数,大多满载香料、草药和宝石,形如小山。唐代两部重要的医学典籍《新修本草》和《本草拾遗》就记载有很多异域药品^②,其中必有阿拉伯药方,因为在成书更早的《酉阳杂俎》中已有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药用植物,如乳香和苜蓿。同样,唐玄宗时期郑虔编纂的7卷本医学巨著《胡本草》和晚唐李珣所著的《海药本草》中都应该记录有很多来自异域的草药与药材。^③沈福伟就认为,《海药本草》中可能会记录了一些阿拉伯药方,而李珣在开始写作这部鸿篇巨作前也应该研究过阿拉伯草药学。^④无论如何,从唐代起,很多阿拉伯草药(如阿曼的乳香和血竭)已经成为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为这一事实提供了佐证。^⑤

与此同时,伊斯兰学者也学习并掌握了一些中医的草药和医学知识。十世纪伊斯兰药学家艾布·曼苏尔在其著作《植物药理学》中记录了白屈菜^⑥的药用特性,指出其产自中国的甘肃地区,用于治疗眼部炎症。另一种阿拉伯人常用的中国草药是月季,伊本·贝塔尔^⑦将其称为“古勒秦尼”^⑧。除此之

^① Shen Fuwei, op. cit., pp. 199-206; [苏丹]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中阿关系》,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5年。

^② Shen Fuwei, op. cit., pp. 120-121.

^③ Ibid., pp. 155-156.

^④ 关于阿拉伯医学和草药的影响, See Shen Fuwei, op. cit., pp. 199-206; [苏丹]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中阿关系》,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5年; [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二卷第一部分《伊尔汗国-旭烈兀汗史》,穆罕默德·萨迪格·纳夏埃特、穆罕默德·穆萨·汗达维、福阿德·阿布杜·穆阿推·绥耶德译,开罗:阿拉伯古籍复兴出版社,无出版年份,第124页。

^⑤ 关于阿曼草药对中医的贡献,参见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著:《在华阿曼人的文化影响》(阿文),马斯喀特:阿曼国家教育文化与科学委员会,2007年版,第36~37页和第47页。

^⑥ 别名山黄连。——译者注

^⑦ 全名阿卜杜拉·本·艾哈迈德·本·贝塔尔(1197—1248),中世纪伊斯兰药物学家、植物学家,著有《药食汇编》等。——译者注

^⑧ 波斯语的音译,意为“中国花”。——译者注

外，原产于中国的葫芦巴也被纳入到阿拉伯草药学中。

而阿拉伯医学传入中国有可能是在名医拉齐^①所生活的年代。伊本·纳迪姆在《目录》有如下记载：“一个中国男人来到我（拉齐）这儿，在我居住的城里待了大约一年时间。他只用了5个月就学会了读写阿拉伯语，而且说起话来雄辩流利，写起字来行云流水。他在离开的前一个月找到我说：‘我快要走了，我想让人给我口述加里努斯^②的16本书，这样我就能记录下来。’我回答说：‘你的时间不够，即使抄写一小部分也来不及。’但他说：‘我希望您能在剩下的日子里助我一臂之力，用您最快的语速向我口述，我会尽力跟上。’于是我们找来了几个学生，我们一起以快语速向他口述，然而他写得竟然比我们说得还快。我们不相信他记下了所有的内容，但当我们核对时，才发现他记得都准确无误。”拉齐惊异于这位中国医生的速记能力，于是他向拉齐解释了所掌握的“合并字”书写方法。^③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位中国医生抄录下来的医书已佚散。

总之，唐朝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文化交流不仅为今天双方的外交与商贸往来奠定了基础，也为中阿之间不可或缺的文化互鉴与交融奠定了基础。其中，阿拉伯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为丝路文化带的建立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工艺的先进水平，传递了中国君主的积极形象。阿拉伯人与世界其他人民同为中国手工业和艺术的高度发达而叹为观止，表达了他们对丝绸和瓷器等中国工艺的赞赏。而中国工艺此后将继续被阿拉伯人所模仿和借鉴。

二 宋代中阿丝路文化带的辉煌

经过唐朝和五代时期的发展，文化带已深深根植于丝绸之路。人文交往促进了中阿商贸活动的繁盛，也为此后几个世纪的双方往来奠定了基础。得益于这一文化带的存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宋代中国找到了发挥影响力的立足点，也让世界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

① 全名穆罕默德·本·宰克里亚·拉齐（850—925），中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医学家和物理学家。——译者注

② 即克劳狄乌斯·盖伦（129—200），古罗马医学家及哲学家。——译者注

③ [阿拉伯]伊本·纳迪姆主编：前引书，第392页。

(一) “蕃学”与人文交流

自唐初前来中国居留并与中国人通婚的阿拉伯商旅,经过数代的繁衍融合,到宋朝时他们的后裔已归化为中国人。大多情况是:其母是中国人,其父是阿拉伯人或具有阿拉伯血统的外族人。他们在家中说着阿拉伯语,履行宗教功课,在市场和学校中则讲中文。随着这一群体的不断增多,宋徽宗在公元1114年特地为“在中国已经居住五世的番客”颁布了继承法,以解决他们的财产继承问题。^①

宋朝时期的阿拉伯人延续了祖辈为子女建立学校的传统,希望后代能够通晓中国文化,融入中国社会。这种专门设立的学校被称为“蕃学”。有的阿拉伯人因尊师重教而名留史册,如在中国史籍中被称为辛押陁罗的阿拉伯富商阿卜杜拉,就曾购置大量田地为广州人民兴办学校,推动了这座城市教育事业的发展。^②

根据中国史料记载,宋朝时有一些阿拉伯学子参加了科举考试。^③ 科举考试对应试者的语言文字表达水平有着极高的要求,这充分证明了这些阿拉伯人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熟练掌握与深刻理解。以一位在《宋史》中名为蒲希密(其名字也许是易卜拉欣)的阿拉伯富商为例,在蒲希密呈交给皇帝的一封信中,他精湛的文学造诣一览无余。这封信至今都被认为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④ 此外,还有很多阿拉伯商人入朝为官,政绩斐然。比如,一个中文名为蒲寿庚的阿拉伯商人,曾任泉州市舶司长达30年之久。^⑤

这一时期的阿拉伯文献中出现了若干与中国喀什有关系的阿拉伯学者。例如,阿兹丁·喀什加里·哈乃斐既是一位优秀的伊玛目,又是学者和教法学家。他研习教法,广收门生,对哈乃斐法学派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⑥ 还有阿

① 李振中:《阿拉伯文化与中华文化:比较研究》,载《阿拉伯人之家》1997年11月第13期。

② 张广达:前引文,第757页。

③ Zhang Junyuan,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Arabs in the Early Times”, *Journal of Omani Studies*, Vol. 6, Part 1, 1983, p. 102.

④ 白德尔丁著:《阿拉伯人与中国关系史》(阿文),开罗:埃及复兴出版社,1950年版,第191~192页。

⑤ Jitsuzo Kuwabara, “On P’u Shou - Keng”,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Vol. 2, 1928, pp. 1 - 2.

⑥ [埃及]贾迈勒丁·艾布·穆哈欣·优素福·本·泰阿里·拜勒迪著:《埃及国王与开罗的璀璨星辰》(阿文)第一卷,艾哈迈德·优素福·纳杰蒂审校,开罗:埃及图书出版社,1956年版,第220~221页。

布·伊沙克·喀什加里·扎卡西·哈乃斐，是著名的教法学家、宗教演说家和文学家。^① 这些伟大学者的祖籍都在今天中国新疆的喀什市。

（二）风物与意象

宋朝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半岛之间的航路众多且便于抵达，中国人对阿拉伯地区的了解不断加深。在《宋史》中有专门记录阿拉伯人的章节。《诸蕃志》的作者赵汝适则在书中详细记录了阿拉伯半岛诸国的情况，甚至对一些内部道路都了如指掌。例如，若从麻啰拔（马赫拉）出发，沿陆路向东北而行，途经奴发（佐法尔）、瓮蛮（阿曼）、白莲（巴林）经 130 余法尔萨赫，会抵达白达国（巴格达）；若从马赫拉出发向西北行，途经施曷（席赫尔）、罗施美（也门），经 80 余法尔萨赫，会到达麻嘉国（麦加）。^②

此书记录了很多阿拉伯半岛诸国的珍贵资料，如关于麦加，书中写道：“自麻啰拔国西去，陆行 80 余程方到；乃佛麻霞勿所生之处。”同时，这一段史料还描述了朝觐活动，以及克尔白天房幔帐和先知陵墓的情况，如“佛居用五色玉甃成。每岁遇佛忌辰，大食诸国皆至瞻礼，争持金银珠宝以施，仍用锦绮覆其居。后有佛墓……”^③。赵汝适的《诸蕃志》应是第一部明确提到麦加的中国古代文献，而《唐书》中只提到了麦地那、先知穆罕默德和天房的黑石。^④ 此外，苏哈尔也出现在《诸蕃志》中，名为勿拔。至于阿曼则载曰：“瓮蛮国人物如勿拔国，地主缠头，缴纒不衣，跣足。奴仆则露首跣足，缴纒蔽体。食烧面饼、羊肉、并乳鱼菜。土产千年枣甚多。沿海出真珠。山畜牧马，极蕃蔗。”^⑤

赵汝适还记录了由阿拉伯半岛销往中国的最重要的产品——乳香，又名薰陆香，并将米尔巴特、苏哈尔和佐法尔称为“乳香之地”。^⑥ 在这一珍贵典籍中还有关于索马里柏培拉、巴格达、巴士拉、米尔巴特、亚历山大等地的

① [埃及] 贾迈勒丁·艾布·穆哈欣·优素福·本·泰阿里·拜勒迪著：前引书，第 100 页。

② Friedrich Hirth and W. W. Rockhill trans., *Chau Ju - 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 - Fan - Chi*, Frankfurt am Main: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Arabic - Islamic Science at the Johann Wolfgang Goethe University, 1996, p. 125.

③ Friedrich Hirth and W. W. Rockhill trans., op. cit., pp. 124 - 125. 译文为《诸蕃志》原文，转引自张星烺编著：《中西交通史汇编》第二册，华文出版社，2018 年版，第 642 页。——译者注

④ Friedrich Hirth and W. W. Rockhill trans., op. cit., pp. 124 - 125.

⑤ Ibid., pp. 130 - 133. 译文为《诸蕃志》原文，转引自张星烺编著：前引书，第 643 页。——译者注

⑥ Friedrich Hirth and W. W. Rockhill trans., op. cit., pp. 195 - 196.

重要信息。开罗第一次在中国史料中被提及，名为“憩野”。^①实际上，《诸蕃志》的重要性不亚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它是研究宋代阿拉伯与中国贸易的重要参考文献。

阿拉伯学者也对两宋时期的中国倍加关注，在这一时期阿拉伯地理和历史学家撰写的著作中有大量关于中国的记载。在伊本·纳迪姆的《目录》中提到了中国的疆域、书法、语言以及中国的墨水。在谈及墨水时他引用了拉齐的记述，“在刻有国王画像的木板上我看到一些东西，尽管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但是上面的墨迹仍然存在。”^②穆格迪西^③在其巨著《诸国知识绝妙类属》中的“海洋与河流部分”写道：“要知道，我们只能在伊斯兰世界看到两片海，其中一个来自中国，另一个则来自苏丹，如果海水抵达伊斯兰王国时则环绕阿拉伯半岛。”当提到中国的海时，他说：“中国的海在每月中旬左右便会昼夜涨潮，包括巴士拉群岛也是这样。”在谈及中国物产时，他写道：“珍珠出自中国，而珊瑚出自罗马。”^④此外，阿拉伯史料中还记录了一些经海路前往中国经商的重要人物，如伊本·塔希尔^⑤在其著作中提到的伊卜拉欣·本·伊斯哈格·随尼·库非就是一例。^⑥还有就是布祖尔克·本·沙赫尔耶里^⑦提到的名为阿卜哈拉的水手：“他旅行到印度后上了一艘中国商船，成为一名熟练的水手，先后去过中国7次。”^⑧宋朝时期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也依然将苏哈尔、阿曼、也门、吉达等阿拉伯地区与中国联系在一起。

除了记述中国的地理位置和物产外，阿拉伯学者还描述了中国人的良好品质与正面形象。虽然一些阿拉伯学者对中国的叙述多引自前人著作，但这

① Friedrich Hirth and W. W. Rockhill trans., op. cit., pp. 102, 124 - 135.

② [阿拉伯]伊本·纳迪姆主编：前引书，第25页和第490页。

③ 全名穆罕默德·本·艾比伯克尔·穆格迪西（947—990），又名贝沙里，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译者注

④ [阿拉伯]穆格迪西著：《诸国知识绝妙类属》（阿文），莱顿：博瑞学术出版社，1906年版，第10页，第12页和第16页。

⑤ 全名穆罕默德·本·塔希尔·阿里·本·艾哈迈德·沙巴尼·麦格迪西（1057—1113），又名盖斯拉尼，中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译者注

⑥ [阿拉伯]伊本·塔希尔著：《最适宜的惯例》（阿文），巴格达：穆萨那出版社，1963年版，第92页。

⑦ 全名布祖尔克·本·沙赫尔耶里·纳黑德·拉姆·霍尔木基（900—950），波斯旅行家和航海家。——译者注

⑧ [波斯]布祖尔克·沙赫尔耶里著：《印度奇观之大陆、海洋与岛屿》（阿文），莱顿：博瑞学术出版社，1883年版，第63~64页。

说明中国的积极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传统代代相传。例如，赛阿利布^①对中国工匠高超技艺的刻画与前辈学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古至今，中国人都擅长制作精巧有趣的工艺品，他们在雕塑人像、镂刻和绘画方面具有很高的天赋。”^②

萨埃德·安达卢斯^③在他的社会哲学著作《民族阶层》中提到了中国人民吃苦耐劳的特性，他写道：“中国拥有最多的人口、最豪华的王国，以及最宽敞的房屋。他们的定居点从日线附近一直延伸到七大地区的北方，而且幸运的是，他们的知识传授给了其他民族。”由于精通实用的手工技艺和绘画技能，“他们成为最能吃苦耐劳的人民，能够忍受在追求精益求精的工作中所遭遇的各种艰辛与苦难”。^④

在艾布·哈密德·格拉纳提^⑤的《心灵精华与绝美精粹》中，中国人具有公正廉洁和开放包容的优良品质，“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当政者十分正直清廉。中国的人口比印度多很多倍，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很多只属于中国人的珍宝，如陶瓷和锦缎等等。中国人像印度人一样崇拜神，不吃动物或者从动物身体里来的食物，比如牛奶和蜂蜜。除禁止穆斯林宰牛外，其余事情概无禁忌。如果有人生病了，会给他服用几日甘蔗，以使其感到满足。如果有身携巨款的异乡人在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去世，他们不会谋求他的遗产，也不会索要他的财产、子女和妻子。”^⑥

（三）清真寺与伊斯兰文化

自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来华阿拉伯人开始修建清真寺，伊斯兰建筑艺术也自那时起对中国建筑产生了影响。例如，建于唐代的广州怀圣寺，其圆柱形的光塔和塔内旋形楼梯就为中国塔式建筑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启示。宋

① 全名阿卜杜勒马利克·本·穆罕默德·本·伊斯梅尔·艾布·曼苏尔·塞阿利布（961—1037），生于波斯内沙布尔，阿拉伯文学家，以散文和诗歌见长，编纂过多部文集和诗集。——译者注

② [阿拉伯] 塞阿利布著：《知识趣闻》（阿文），伊卜拉欣·艾卜亚里和哈桑·卡米勒·绥尔非校订，开罗：阿拉伯书籍复兴出版社，1965年版，第220~221页。

③ 全名艾布·卡西姆·萨埃德·本·艾哈迈德·安达卢斯（1029—1069），西班牙托莱多城伊斯兰法官，著有科学、哲学和思想史等方面的多部著作。——译者注

④ [阿拉伯] 萨埃德·安达卢斯著：《民族阶层》（阿文），开罗：幸福出版社，1906年版，第10页。

⑤ 本名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希姆·马兹尼·盖斯（1080—1169），又名艾布·哈密德·格拉纳提，中世纪西班牙安达卢西亚旅行家。——译者注

⑥ [阿拉伯] 艾布·哈密德·格拉纳提著：《心灵精华与绝美精粹》（阿文），该部分内容由法国东方学家基·斐兰（G·Ferrand）译介，刊登于1925年7月出版的《亚洲杂志》上，第48~50页。

朝时期，随着伊斯兰文化的广泛传播与兴盛，阿拉伯人相继修建了以泉州清净寺和扬州仙鹤寺为代表的多座清真寺。^①在这一过程中，阿拉伯伊斯兰建筑艺术和理念不断传入中国，对宋代中国砖石建筑的发展与演变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是泉州清净寺的建造，标志着阿拉伯砖石建筑工程学传入中国。伊斯兰门窗艺术样式也在随后几个世纪中在中国建筑上留下印记，推动了中国建筑艺术的多元化发展。^②

很多宋代时期建造的清真寺都是当地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心，而在北京牛街清真寺中就有两座宋朝来华讲学的穆斯林学者的坟墓。事实上，宋代穆斯林不仅可以建造清真寺，他们的文化传统也得到了朝廷的尊重和保护。宋朝政府还从在华穆斯林中选出一名法官，允许其按伊斯兰传统管理穆斯林的日常事务。此外，官方还允许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设立专门的衙门，依照伊斯兰教法处罚了一名触犯中国法律的阿拉伯商人。^③

（四）商品与科技融合

阿拉伯草药和处方在两宋享有盛誉，得到了中国百姓的广泛认可。公元1208年至1227年期间，中国共进口了17种约几十吨的药材。公元1221年，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以阿拉伯草药为主的药方，如在《太平惠民》中就有10种。公元1225年至1227年期间，此类药方增加到了17种，从1241年到1252年又进一步增加到28种。^④中国史料记载，公元982年，宋太宗下令进口37种（也有史料记载为38种）阿拉伯药材，在很短的时间内，上百公斤的各类药材就被送入皇宫。^⑤此外，阿拉伯人也向中国出口用来制药的沥青胶和硼砂盐。^⑥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医学没有明确的科类划分，也许是受到了阿拉伯医学的影响，中医在宋朝被分为了9个科类：内科、神经科、儿科、眼科、肿瘤科、妇科、咽喉科、外科与针灸。^⑦不仅如此，阿拉伯人还向中国人传授了从玫瑰中提取香水的蒸馏技法。而在此之前，中国人只是从花叶上

① 关于中国清真寺的历史及作用，参见李华英著：《中国的清真寺》，外文出版社，1989年版。

② 同上书，第82~83页。

③ 张广达：前引文，第755页。

④ 冯今源著：前引书，第142~143页。

⑤ 同上书，第142页。

⑥ Friedrich Hirth and W. W. Rockhill trans., op. cit., p. 22; 张广达：前引文，第761页。

⑦ 李振中：前引文，第10页。

收集露水。^①

相应地，中国工艺与技术也继续通过文化带传入阿拉伯。宋朝时期，埃及人开始对中国瓷器进行仿制，福斯塔特古城就以仿宋彩瓷闻名。而埃及的萨德学校模仿宋瓷制作出了一种釉彩瓷器。到马穆鲁克时期，埃及对中国瓷器的仿制规模进一步扩大。公元11世纪，埃及已经能够利用中国的造纸技术量产纸张，满足本地需求。公元1040年，一位旅行家发现开罗的商人们用纸来包裹蔬菜和香水。中国的印刷术也在这一时期传到了埃及，一些专家发现，很多在公元900年至1350年期间出版的伊斯兰教经典都是借助中国印刷术制作完成的。而指南针在南宋时期传入阿拉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郭应德认为此后阿拉伯人又将指南针于公元1180年传到了欧洲。尽管有些学者认为最早开始使用指南针的是阿拉伯人而非中国人，但这种说法缺乏确凿的证据。无论如何，指南针都是中阿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之一。

总之，丝路文化带在宋代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期，其活动愈加活跃，影响也不断增强，不仅书写了中阿文化交流史的辉煌篇章，也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的互学互鉴。

三 元代中阿丝路文化带的蓬勃活力

随着蒙古将领旭烈兀攻陷阿拔斯王朝首都巴格达，中阿友好往来的辉煌篇章在公元1258年告一段落。尽管蒙古人结束了中国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之间长达数百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并把这些阿拉伯国家变成了其庞大帝国的一部分。但是，蒙古人从被征服民族中也汲取了思想养分，建立起一个促进不同民族相互理解的大环境。元朝时期，中西方交通大开，激发了中阿人员和经贸交流的蓬勃活力，呈现出繁荣态势。

（一）民间游历、通商与友好往来

元朝统治者继承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善待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传统。著名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称：“穆斯林商人有自己的聚居区、清真寺和市肆。每个聚居区内都有自己的法官和教长。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

^① 李振中：前引文。

比得上中国。”^① 阿拉伯地理学家们也延续了前人正面记述中国形象的传统，如卡兹维尼^②写道：“中国地大物博，盛产五谷、蔬菜、瓜果、甜糖。”“中国的皇帝被描述为公正贤明的君主。”^③ 艾布·斐达^④在谈到中国人的特点时指出：“中国人在政治上有智慧、公正，且是心灵手巧的民族。”^⑤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对阿拉伯人文地理情况的了解日益深入。在元代著作《西使记》中可以发现一些有关天方（麦加）的资料，如“天方（麦加）位于距哈里发国首都300里的地方，哈里发在天房内，那里也是天使所在的天房，葬有先知的祖父。他们藏有很多圣书，天房统治着它周围的几十个城市。”而汪大渊等中国旅行家则远赴阿拉伯半岛，进行实地考察。汪大渊在公元1328年至1334年期间游历了阿拉伯半岛，于1340年回到中国。归国后，汪大渊撰写了著名的《岛夷志略》，记录了阿拉伯半岛、埃及和马格里布地区的情况，以及他本人游历麦加和麦地那的经历。^⑥ 除中国旅行家外，也有中国穆斯林为履行宗教义务而前往阿拉伯半岛。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介绍了一位中国穆斯林诗人买闾。^⑦ 买闾的祖父名为哈吉，说明他早在元代早期就曾赴麦加朝觐。

元朝期间，中阿之间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也门亚丁港的重要性在元代不断上升，成为与中国开展贸易的枢纽和进口瓷器集散地。夏姆斯丁·本·阿卜杜拉^⑧在其著作《陆地与海洋奇观的世代精英》中就写道：“亚丁港的存

① [阿拉伯] 伊本·白图泰著：《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文）第二卷，艾哈迈德·阿瓦马里和穆罕默德·嘉德校订，开罗：阿米尔宫出版社，1933年版，第25页。

② 全名宰克利亚·本·穆罕默德·卡兹维尼（1203—1283），中世纪医学家、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译者注

③ [阿拉伯] 卡兹维尼著：《创世奇观》（阿文），贝鲁特：萨迪尔出版社；贝鲁特出版社，1960年版，第46页和54页。

④ 全名艾布·斐达·伊斯马仪·本·阿里（1273—1331），又名伊马德丁，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历史、地理学家。著有《人类史纲要》和《列国地域志》等。——译者注

⑤ [阿拉伯] 艾布·斐达著：《人类史纲要》（阿文），开罗：埃及侯赛尼出版社，无出版年份，第92页。

⑥ Chen Dezhi et al., *The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6, pp. 433-434.

⑦ Ch'en Yüan, *Western and Central Asians in China under the Mongols: Their Transformation into Chinese*,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Ch'ien Hsing-hai and L. Carrington Goodrich, Los Angeles: Monumenta Serica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6 (Paper back Edition Nettetal 1989), pp. 164-165.

⑧ 全名沙姆斯丁·本·阿卜杜拉·穆罕默德·艾布·塔利卜·安萨里·苏非·大马士基（1256—1326），又名谢赫拉卜瓦，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其著作是研究十字军东征的重要参考资料。——译者注

是在中国、印度、科尔曼、波斯和阿曼商船往来交易的前提。”^①

（二）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阿拉伯和波斯的古代文献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文化交融的丰富史料，也为我们展示了元代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生活状况以及丝路文化带的非凡活力，其中特别描绘了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教在中国广大地区的传播盛况。

在这一时期，有相当数量的蒙古人、突厥人和其他一些中国民众皈依伊斯兰教。^② 在蒙古统治者中，统御唐兀（今天的宁夏）之地的阿难答亲王在军中传播伊斯兰教，有超过 15 万官兵皈依了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和穆斯林军官的带领下，中国各地都出现了军人和平民皈依伊斯兰教的浪潮。^③ 以阿拉伯人和新穆斯林为主的军人、技术人员和行政官员承担起了传教的重任，将伊斯兰宗教文化传播到他们所到之处。从内蒙古到云南的广阔土地上，数百座清真寺拔地而起。由此可见，元代的清真寺已不再像唐宋时期那样集中于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而是开始向内陆城乡延伸。

随着元朝经济步入繁荣，中国与西亚的贸易往来日渐频繁，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大量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进入中国，甚至在元上都忽必烈汗的宫城内建造了一座清真寺。^④ 伊本·白图泰在公元 1347 年抵达中国后发现，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在中国广受尊重，安居乐业，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呈现欣欣向荣之势。于是，伊本·白图泰描绘了这一美好图景：“在中国的每座城市，都有一个穆斯林聚居区。他们有专门的房屋，也有可供聚礼的清真寺。绝大多数人都得到尊重和礼遇。”^⑤ 伊本·白图泰记述了他在广州和泉州等地穆斯林聚居区的所见所闻。每到一处，他都受到了当地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法官、教长和富商们的热烈欢迎与款待。^⑥ 伊本·白图泰还特别

① [阿拉伯] 沙姆斯丁·本·阿卜杜拉著：《陆地与海洋奇观的世代精英》（阿文），圣彼得堡：皇家书局，1865 年版，第 216 页。

② Ch'en Yüan, op. cit., pp. 164 - 165; 或参见 [苏丹] 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中阿关系》，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5 年。

③ 关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元朝时期影响力的扩大，参见冯今源著：前引书。另见 [苏丹] 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蒙古统治下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研究》（阿文），载《穆罕默德·本·沙特伊斯兰大学学报》2007 年第 2 期。

④ Morris Rossabi, "The Muslims in the Early Yuan Dynasty", in John D. Langlois, Jr. ed.,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73.

⑤ [阿拉伯] 伊本·白图泰著：前引书，第 248 页。

⑥ 同上书，第 253 ~ 257 页。

描述了他在杭州穆斯林社区停留 15 天的经历。^① 伊本·白图泰等阿拉伯学者和旅行家所记录的在华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情况，对研究阿拉伯人华化史、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和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史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在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广泛传播的影响下，至少在公元 1311 年以前，元朝统治者就已经设立了专门处理伊斯兰事务的官方机构藩长司。在 1312 ~ 1328 年期间，元朝政府对该机构进行了重组，并提供财政支持。^② 此外，根据拉希德丁·法德勒拉·哈姆扎尼^③在《史集》中的记载，元朝皇帝颁布敕令建立回回学校，让穆斯林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并付诸实践。^④ 在元朝政府的许可与鼓励下，阿拉伯人和其他各族穆斯林在全国范围内兴建回教学校，其中以建于真定（今河北）的一所回教学校最为著名。这所学校除了教授伊斯兰科学知识外，还教授阿拉伯语和波斯语。^⑤ 公元 1289 年，元朝政府创立了一所专门教授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书法的官方机构；^⑥ 同年，又为阿拉伯和其他民族的青年穆斯林开办了回回学校，并在 1314 年扩大为回回国子监。^⑦

（三）中阿科学文化的交流

元代大量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来华定居，不仅对中国及周边地区的文化环境产生了影响，也促进了中阿双方在科学文化领域的交流与互鉴。

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在中国天文学领域的贡献最为突出。早在宋朝时期，就有来华阿拉伯人马依泽参与撰修中国历法。^⑧ 星期日制也是由阿拉伯天文学家引入中国的。^⑨ 元朝时期，阿拉伯和穆斯林天文学家又将伊斯兰天文学的诸多知识及产品带入中国。公元 1267 年，著名天文学家扎马鲁丁来到中国，随他一起而来的还有浑天仪、天球仪和地球仪等 7 个用于观测星象的天文仪器。扎马鲁丁依据伊斯兰历法为中国人编制了一套历法，名曰《万年历》。扎马鲁丁还将埃及法蒂玛王朝天文学家伊本·尤努斯编制的《哈基姆星表》介绍到了中国，并在此基础上制作了名为“万能仪（星表）”的天文工具。中国天

① [阿拉伯] 伊本·白图泰著：前引书，第 258 ~ 259 页。

② 冯今源著：前引书，第 18 页。

③ 即拉施特（1247—1318），历史学家，伊儿汗国丞相，主持编撰《史集》。——译者注

④ [波斯] 拉施特主编：前引书，第 124 页。

⑤ Morris Rossabi, op. cit., pp. 273 - 274.

⑥ Ibid., p. 286.

⑦ Morris Rossabi, op. cit., p. 285; Ch'en Yüan, op. cit., p. 211.

⑧ [伊拉克] 哈迪·阿莱维著：前引书，第 302 页。

⑨ 同上书。

文学家郭守敬正是借助伊斯兰天文学的测量和计算方法成功编制了《授时历》。在元代北京天文台的 242 册藏书中有 26 本是阿拉伯文书籍。^① 从 13 世纪中叶起，伊斯兰历法就成为编制中国历法的重要参考，一直持续了 400 年左右。^② 可以说，伊斯兰天文学对中国天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中国人也参与到了伊斯兰天文学的研究工作中。公元 1271 年，忽必烈设立了一个由阿拉伯和穆斯林天文学家与中国天文学家共同主持的伊斯兰天文学研究机构。而哈迪·阿莱维则指出，在阿拉伯古籍中记载有一位中国天文学家，他曾与纳西尔丁·图西^③一同在旭烈兀汗资助建造的马拉盖天文台工作。这位中国天文学家的名字在阿拉伯史料中被记载，^④ 他为伊斯兰天文学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在数学和地理学方面，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学者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他们将先进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方法引入中国，为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提供了启示与帮助。郭守敬就从阿拉伯人发明的弧矢割圆术中受益良多。在整个元代，有 15 部阿拉伯文数学著作传入中国，其中就有《几何原本》这样的经典之作。很多阿拉伯地理典籍也被带到了中国，增进了中国地理学家对中亚和中东的了解，推动了中国地理学和地图学的发展。^⑤ 元代地理学家朱思本绘制的《舆地图》就参考了很多阿拉伯地理典籍中的资料。^⑥

在医学领域，阿拉伯和穆斯林学者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中阿医学的交流与发展。公元 1246 年，一个叫尔萨^⑦的叙利亚占星家来到中国觐见了蒙古皇太后唆鲁禾帖尼。这位通晓多门亚洲语言的学者不仅擅长天文学，还

① 冯今源著：前引书，第 131~141 页。关于穆斯林在天文学领域的贡献，参见杨志玖著：《元朝回族史稿》，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91~300 页。

② Bai Shouyi ed., *An Outline History of China*,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82, p. 324; 哈迪·阿莱维：《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关系史》，载《文化维度》1993 年第 1 期，第 32 页；白寿彝：《中国穆斯林在历史上的贡献》，辑自《文化丛书》，外文出版社，1982 年版，第 104~105 页。

③ 全名穆罕默德·本·穆罕默德·本·哈桑·图西（1201—1274），又名纳西尔丁·图西，十三世纪波斯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译者注

④ [伊拉克]哈迪·阿莱维著：前引书，第 302 页。受不同抄本的影响，这位中国天文学家的名字在近代西方学者的著作中有多种写法。中国学者根据这些写法将其音译为傅穆斋、傅孟吉、包蛮子或屠密迟。——译者注

⑤ 冯今源著：前引书，第 136~138 页。

⑥ Morris Rossabi, op. cit., p. 273.

⑦ 即元代天文学家、医学家爱薛。——译者注

精通医学，翻译了多部医学典籍。^① 元朝统治者非常重视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公元1270年，忽必烈下令在元大都和上都建立回回药局，为达官显贵治病疗伤，还在蒙古地区设立了伊斯兰草药局。^② 阿拉伯药材也在这一时期继续进入中国。根据元代史籍中的记载，有13种草药进口自阿拉伯地区。^③ 元朝灭亡后，有人在元大都宫廷内找到了36部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典籍。^④ 与此同时，中国人不仅受益于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也向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传授了中国传统医学。例如，拉施特在《史集》后部的总索引中就记录了中国医学典籍在阿拉伯和波斯的传播：“这些书此前已散佚，我们颇费了一番功夫才找到副本，将其从汉语翻译成波斯语，然后再译为阿拉伯语。”这4本书是：《中国脉学的理论与实践》《我们正在使用及未使用的草药学》《从脉学和方剂两部分介绍中国的药理学》和《中国的政治典章和礼仪》。^⑤

在建筑学领域，杰出的穆斯林建筑家也黑迭儿^⑥设计建造了元大都，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然而，在《元史》中却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位建筑大师的记载，只能在其他文献和纪念其子马合马沙的石碑上找到关于他生平事迹的记载。根据碑文上的记载，也黑迭儿的祖先为唐朝大食人。元世祖忽必烈登基后，委任也黑迭儿掌管茶迭儿局总管府，负责建造元大都。^⑦ 也黑迭儿不仅设计了气势磅礴的宫殿与恢宏华丽的皇家厅堂、寺院和庙宇，还规划了城墙、宫门、都城内的通衢及居民区。宫城内的建筑布局尤为精妙，大到官署、宫阙，小到储藏室和仆人居所一应俱全，浑然一体。^⑧ 建筑设计的亮点之一是一

① 张广达：前引文，第779页。

② Morris Rossabi, *op. cit.*, pp. 284.

③ 冯今源著：前引书，第143页。

④ Morris Rossabi, *op. cit.*, p. 284.

⑤ [波斯]拉施特主编：前引书，第172页。

⑥ 笔者认为，这位阿拉伯穆斯林建筑大师的本名应为叶海亚·塔希尔，很多中国学者和研究人员都使用了错误的音译名。根据笔者的调查，在1955年4月的《中国建设》杂志上，刊登了中国学者Feng China - Sheng所著论文的阿译版。文中将这位建筑大师的阿文名字写为“伊赫提亚尔丁”。很多中国学者和研究人员都使用了该音译名。这位建筑大师的中文名字在其子马合马沙的墓碑上被写为“也黑迭儿”，陈源据此英译为Yeh - Hei - Tieh - erh。但根据笔者对中文文献的理解，与“也黑迭儿”对应的阿拉伯名字应该是叶海亚·塔希尔。该名字不仅在发音上更接近也黑迭儿，也符合阿拉伯人的命名习惯，与也黑迭儿是阿拉伯人后裔的史实是相一致。而无论是“伊赫提亚尔丁”还是“毕赫提亚尔丁”，都是伊朗和中亚穆斯林的名字，极少在阿拉伯人中使用。See Ch'en Yüan, *op. cit.*, pp. 218 - 249.

⑦ Ch'en Yüan, *op. cit.*, pp. 217 - 220.

⑧ *Ibid.*

条贯穿城市的中轴线，足见设计者之匠心。也黑迭儿于1285年参与建造的元大都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北京城面积相当，是如今北京城的基础。也黑迭儿当年设计规划的宽敞街巷保留至今。东单大街、西单大街、东四大街、西四大街、东直门大街、鼓楼西大街、朝阳门内大街……这些街道在元大都时便已存在，只不过街名略有不同而已。^①

元代中国瓷器不断销往大马士革、巴格达、伊朗和土耳其等地，并在马穆鲁克王朝治下的埃及被大规模仿制。^②自唐宋时期传入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也在埃及蓬勃发展。这一时期中阿技术交流的活跃不仅得益于频繁的商业往来，也与蒙古人初期的征服活动有关。蒙古人在驱使成千上万的阿拉伯工匠和学者前来中国的同时，也将大量中国工匠和技师带到了伊拉克。这些人中有制造云梯和工程机械的能工巧匠，帮助蒙古军队攀越城墙，攻克巍峨的堡垒。^③蒙古人的军事活动间接为中阿生产技术的交流与互动奠定了基础。

除了被蒙古军队裹挟而来外，也有很多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是在形势稳定后主动来华的。这些人的到来无疑推动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然而，他们及其后代与唐宋时期来华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一样，在与儒家文明的对话和交流中实现了文化交融与民族融合，最终归化为中国人，有些甚至成为著名的儒学家、诗人和学者。比如，河南回回炮手总管勛实带就非常崇尚儒学，他耗时十年建立书院，传播儒家思想。他的儿子木音帖木儿则建造藏书阁，专门收藏经史子集。^④在中国文学领域，一些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萨都刺、丁鹤年、别里沙、鲁至道、吉雅谟丁、买间等，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萨都刺。中国史书有载，萨都刺生长在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诗人毛晋称他为“以北方之裔而入中华，日弄柔翰，遂成南国名家”，认为萨都刺的诗歌清丽俊逸，风格独特，与众不同。^⑤萨都刺著作颇丰，其中一部《雁门集》流传至今，脍炙

① 参见刘俊文著：《古老而现代的中国大都市——北京》，穆罕默德·阿布贾德译，外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② [阿拉伯]宰齐·穆罕默德·哈桑著：《法蒂玛人的宝藏》（阿文），埃及图书出版社，1937年版，第182页。

③ Gafar Karar Ahmed, "Sino Arab Relation during Tang Dynasty (618 - 907 A. D)", *Journal of Tang Studies*, Vol. 5, 1999, pp. 346 - 354.

④ Ch'en Yüan, op. cit, p. 63.

⑤ Ibid., p. 150 - 151.

人口^①。另一位颇具影响力的穆斯林诗人丁鹤年为元末诗坛巨擘，他潜心钻研儒家学说多年，所创作的诗歌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诗风高古，不拘一格。^②此外，既是官员又是历史学家的阿拉伯人瞻思在科学和文化领域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他邃于《经》，而《易》学尤深，编撰了12本涉及儒家、道家、星象、地理、历史和水利的著作，如《河防通议》《西国图经》和《西域异人传》等。^③

以上是元代中阿文化与人文交流的一些重要成就，诸如此类的文化互动与交流至少持续到1368年。当朱元璋消灭蒙元政权建立明朝后，随着亚洲各蒙古政权的崩溃以及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陆上丝绸之路基本停滞，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主要渠道。而明清逐渐加力的海禁政策，使丝绸之路由盛转衰，中阿文化交流出现转折，文化带逐渐归于沉寂。

四 结语

综上，阿拉伯与中国不仅建立了一条丝路经济带，还构建了一条富有多彩活力的文化带。这条文化带在唐朝步入兴盛，于两宋达到巅峰，在元代继续保持蓬勃活力。紧随中阿商旅和外交使节，学者、诗人、医生、艺术家、工匠技师、传教士等纷纷加入到建设这条文化丝路的队伍中。这些建设者们拥有惊人的文化理解能力与人文精神。他们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文化带上传播着宗教、哲学、音乐、诗歌、草药，体现着人类团结合作的精神。丝路文化带及其所倡导的理念，不仅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的经贸往来与商业繁荣，也为沿线人民的相互了解与民心相通奠定了基石。中阿文化交流借助丝路文化带取得的丰硕成果泽被世人，影响深远。东西方文明通过丝路文化带互学互鉴，实现了文明对话与和谐共生。

本文基于中阿古代典籍文献揭示了持续数个世纪的丝路文化带的繁荣发展和中阿文化交流盛况。而在文献研究之外，考古挖掘也成为丝路文化带上有力的文化交流佐证。在也门亚丁，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不同时期的中国瓷器，其中一些瓷器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13至16世纪。在阿曼古都苏哈尔出土过

① Ch'en Yüan, op. cit, p. 150 - 151.

② Ibid., p. 210.

③ 《元史》卷一九〇《瞻思传》。

一件唐代瓷器，以及一个小型琉璃瓶和黑色双人像托举的莲花坐佛像。^①此外，还发掘出了一些公元14至15世纪时期的中国商品。在首都马斯喀特博物馆中，藏有大量中国古代陶瓷器皿和一些罕见的元代蓝色瓷片。在巴林城堡和阿联酋朱帕尔等遗址中，考古学家们也发现了公元14世纪至15世纪的中国瓷器及大量残片。^②沙特阿拉伯学者阿里·本·易卜拉欣·乌巴指出，在沙特西部红海沿岸地区，各式各样的中国瓷器在阿尔贾尔、胡拉、欧维尼德、阿斯拉、塞林和沙拉伽等古代港口遗址中被挖掘出来。^③在沙特东部省哈萨地区的欧盖尔港、利雅得附近的阿尔卡吉、麦地那附近的里卜宰、盖西姆省的德里、欧拉地区的马布亚特，以及塔布克省的拜德阿和拜达也发现了中国瓷器残片，大部分可追溯到唐宋时期。除阿拉伯半岛外，埃及、索马里、苏丹、伊拉克等国也都发现了中国瓷器的身影。^④中国古代货币在阿拉伯国家也多有发现。人们在阿联酋哈伊马角发现了公元8世纪的中国钱币，^⑤在沙特东部盖提夫发现了公元998~1097年期间的稀有钱币。^⑥从巴士拉到亚丁再到苏丹东海岸的萨瓦金和阿伊扎布，考古学家们除瓷器外也找到了许多宋代钱币残片。这些考古发现无不印证了文化带上的两个友邦——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绵延数世纪的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与文化往来。

古丝路文化带的深厚底蕴与丰富遗产，为当代阿拉伯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奠定了基础。“一带一路”的建设者们应充分重视新丝路文化带的建设，深化阿拉伯世界与中国的人文交流。历史经验证明，文化带的建立必会促进“一带一路”沿线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

① Zhuang Jing - Hui, *Translated Papers on the Chinese Relations with the Foreign Countries*,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s Publishing House, 1984, p. 196; 保罗·科斯塔在卡布斯苏丹大学“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1990/11/20-21）上的论文，保罗·科斯塔：《好望角航路发现前阿曼商人与远东地区贸易往来的考古证据》，马斯喀特：国家文化与遗产部，1990年，第130页。

② [日本]三上次男著：《陶瓷之路》，庄锦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97页；保罗·科斯塔：前引文，第130页。

③ 阿尔贾尔大概位于延布以南，胡拉位于乌姆鲁吉以北，欧维尼德位于沃季赫以南，阿斯拉位于吉赞西北，塞林位于利斯以南，沙拉伽位于吉赞。——译者注

④ 有关在阿拉伯地区发现中国陶瓷的更多信息，参见[苏丹]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中阿关系》，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5年，第33~44页。

⑤ [阿联酋]《联盟报》1997年12月10日。

⑥ [日本]三上次男著：前引书，第197页。